

低保群体规模缩减的“就业激活”解释

——来自外卖平台入驻的证据

刘璐婵*

内容提要 本文以外卖平台入驻作为外生冲击模拟准自然实验，从“就业激活”视角分析了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缩减的原因。借助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外卖平台入驻带来的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缩减效应。分析发现，各省的低保受助人�数在外卖平台入驻后显著下降，且该效应持续约 5 年。该结论不受低保标准波动、地方政府困难群体转移支付强度、社会保险项目承接等因素的影响，但估计效应会因新增登记失业人数增加、城市人口聚集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提升而增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外卖平台入驻通过调节就业环境和提升劳动收入，提高了低保受助者的劳动参与率和经济状况。低保受助者能够通过赚取劳动收入重建生计模式，逐步摆脱对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依赖，最终退出低保制度。

关键词 低保 平台就业 福利退出 就业激活

一 引言

社会救助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林闽钢，202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对社会救助制度与就业促进政策的联动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国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中最基础、最核

* 刘璐婵，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电子邮箱：llc7.my265@aliyun.com。作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批准号：23BGL242）的资助。

心的组成部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低保）发挥着解忧纾困、兜底保障的作用。但自2014年起，低保受助人数量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见图1），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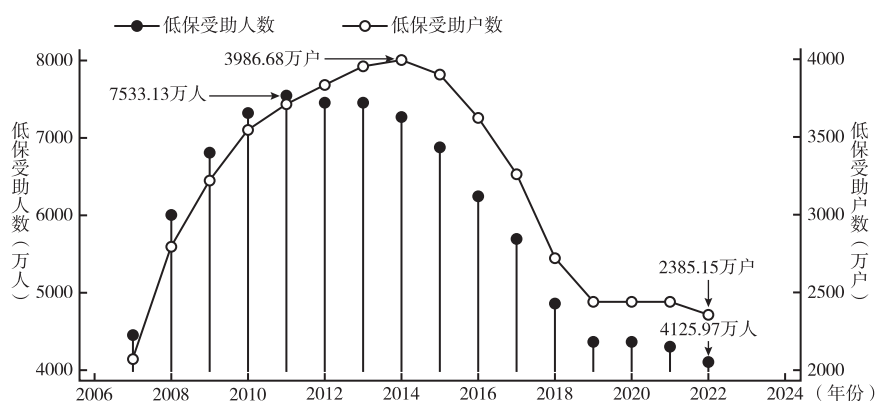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受助者规模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对于中国低保受助人数量逐年下降的现象，学术界从制度纠偏、系统性遗漏、资源限制和政策成效等维度探讨了低保受助者退出福利制度的政策与制度驱动力（边恕等，2023；贾洪波、毛博书，2023；李棉管，2019；刘万里、吴要武，2016；岳经纶、胡项连，2018）。但是，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缩减除了受到制度推力影响外，也会受到劳动力市场拉力的影响。就业可以对受助者产生激活作用，使其参与生产劳动进而逐步退出福利制度（Card & Hyslop, 2005；Huber et al., 2011）。可见，既有的政策视角不仅忽略了社会救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联动，也忽视了低保受助群体实现劳动自立的可能性。因此，基于能够体现福利受助者主观能动性的“就业激活”视角是探究低保受助人数量下降原因的新方向（吉尔伯特、沃黑斯，2004；van der Klaauw & van Ours, 2013）。

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美团、饿了么等外卖配送平台提供的骑手岗位不仅吸纳了大量失业人员和创业受困群体^①，让失业者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者有了重新就业的意愿与机会，而且还为从业者提供了较有吸引力的薪酬（Dunn，

^① 来自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3）》，参见 <http://www.sic.gov.cn/sic/93/552/557/0223/10741.pdf>。

2020; Gao, 2024)。这说明平台零工就业对诸如低保受助者等就业困难群体具有激活效应,有助于其通过就业实现自立并退出福利制度。如图 2 所示,外卖平台在 2011 年以后陆续入驻各省并于 2014 年左右在全国铺开,而低保受助人人数恰恰是在 2014 年前后开始下降,低保受助人人数下降与外卖平台入驻具有共时性。那么,外卖平台入驻是否能够解释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缩减?平台零工就业能否赋予低保受助者退出福利制度的机会与动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外卖平台的入驻又是如何影响低保受助者,进而使其退出低保制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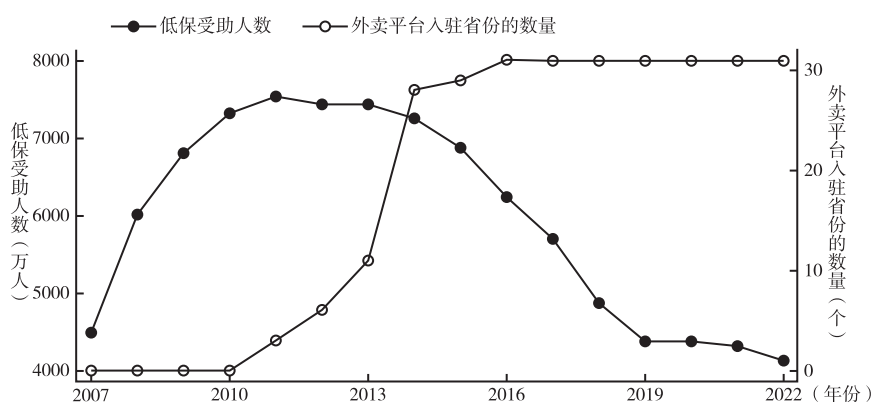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低保受助者规模与外卖平台入驻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基于此,本文以平台零工就业为窗口观察劳动就业的福利退出效果,尝试从就业激活的角度剖析低保受助人人数下降的原因,并紧密结合平台经济创造的新型就业模式分析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劳动自立的可能性。借助外卖平台入驻这一外生冲击模拟准自然实验,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本文发现以外卖平台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力量能够长期持续地引致福利退出。因为外卖平台入驻能够促进劳动参与和改善经济状况,进而为低保受助者重建生计模式和摆脱对低保金依赖提供了良好契机,由此可以认为平台零工就业是数字经济时代低保受助者规模缩减的重要原因。

本文结论兼具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既往关于福利退出的研究多基于政策驱动视角,对救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关联性回应不足。关于就业激活的研究也尚未结合数字经济这一时代背景开展分析。本研究以外卖平台入驻作为观察切口,不仅为学界理解福利退出机制提供了劳动力市场视角,而且在数字经济时代为判断就

业激活动力机制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证据。另一方面，对低保受助人人数下降的就业激活解释充分体现了受助者的主观能动性，破除了以往关于“低保养懒汉”的质疑，为民政、人社等实务部门制定困难群体就业援助政策提供了依据。更重要的是，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验证了就业困难群体在新就业形态中实现劳动自立的可行性，有助于引导低收入群体充分融入平台经济，进而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低保受助人人数下降：从政策视角到劳动力市场视角

近年来，中国低保受助人人数的持续稳定下降引发了学界热议，目前已形成制度纠偏、系统性遗漏、资源限制和政策成效等多重解释路径。在制度纠偏解释路径下，低保受助人人数的缩减被视为社会救助制度纠偏的结果。民政部在全国开展的清查“错保”、“人情保”专项整治活动和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提升了制度对象瞄准精度（方珂等，2023），而且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系统也强化了“错保”的清退力度（刘万里、吴要武，2016）。但与制度纠偏路径的积极执行属性相反，系统性遗漏解释路径则关注低保政策执行中消极的一面，认为低保受助人人数的下降是“自保式执行”策略催生的受助群体收缩（李棉管，2019），也是反腐败政策语境下基层民政工作人员秉持“能不保就不保”行动逻辑的消极后果（岳经纶、胡项连，2018）。资源限制解释路径认为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缩减是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因为当前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中各省分担的转移支付比例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基于省钱动机主动限制救助对象规模（边恕等，2023）。同时，部门间的博弈、制衡导致民政部门减少审批，进而让边缘群体无法被纳入低保（王强，2023）。政策成效解释路径还提出低保制度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刘璐婵，2023），随着特定时期扶贫任务的完成和共同富裕进程的推进，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必然会减少（贾洪波、毛博书，2023；李鹏、张奇林，2023；李琴、岳经纶，2021）。

整体来看，制度纠偏、系统性遗漏、资源限制和政策成效等论点明显持供方立场，即这些论点的逻辑是寻找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缩减现象背后的政策和制度驱动力。但是，低保受助人人数的下降也许不全是由政策驱动的，不受助或中断受助也可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程璆、岳经纶，2023；李琴、岳经纶，2021）。由此可见，政策视角会因倚重被动清退思路而忽视受助者的主观能动性。

此外, 研究显示, 救助项目的受助人数规模波动往往与宏观经济形势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关联 (安超, 2021; Bergmark & Bäckman, 2004; Dahl & Lorentzen, 2003; Hoynes, 2000)。失业率对福利退出率的负向影响也被大量研究证实 (Ayala & Melnychuk, 2024; Bergnehr, 2016; Ganong & Liebman, 2018; Hill & Murray, 2008)。更重要的是, 已有研究发现本地劳动力市场需求增加会引发福利退出 (Scherpf & Cerf, 2019), 就业和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会降低福利使用 (Achdut & Stier, 2016), 劳动参与是受助者退出救助以及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 (Achdut & Stier, 2021; Vaalavuo & Sirniö, 2022)。可见, 参与劳动力市场赋予受助者退出福利的机会与动能, 劳动力市场因素对福利退出的影响不容忽视。劳动力市场能够在制度因素之外影响受助群体的规模, 这意味着受助者可以通过劳动就业实现福利退出, 也为从“就业激活”视角解释低保受助人数下降提供了可能。

(二) 就业激活与福利退出: 外卖平台就业的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 中国低保受助者的就业状况不佳, 属于典型的就业困难群体。具体而言, 人力资本匮乏、家庭照顾负担重、就业意愿不足是制约低保受助者就业的重要因素 (韩克庆、郭瑜, 2012; 马爽, 2017; 王燊成, 2023)。这些因素阻碍了受助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即使低保受助者处于在业状态, 其主要的就业渠道也是灵活就业 (刘凯、张瑞凯, 2017), 岗位基本分布在非正规经济部门 (王燊成、刘宝臣, 2018; 姚建平, 2017)。这意味着低保受助者在就业机会和生计模式上面临重重障碍。鉴于此, 低保受助者往往难以通过劳动参与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 家庭生存处境未得到改善 (安超, 2021), 因而也就缺乏退出福利制度的动机与能力。

近年来,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 平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Lehdonvirta, 2018; Pongratz, 2018)。平台零工就业群体包括大量就业不足、长期失业或者经济状况较差的劳动者, 这些就业困难群体能够通过零工就业保持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并获得一定的收入 (Dunn, 2020)。研究发现, 零工平台的建立不仅降低了入职门槛、规避了就业歧视, 而且灵活的时间安排实现了劳动者的工作 - 生活平衡, 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了从业机会 (Berg, 2016; Bonhomme & Muldoon, 2024; Lam & Triandafyllidou, 2021; Mayer et al., 2024)。同时, 平台零工就业有助于改善就业困难群体的经济状况 (Schor et al., 2020; Sundararajan, 2017; van Doorn et al., 2023)。可见, 平台零工就业既能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就业机会, 还能改善其生计状况, 因而具有较强的激活效应。

外卖平台已成为中国主要的零工就业平台。2023 年, 美团平台骑手数量高达 745

万人^①，饿了么平台骑手规模也超过 400 万人^②。作为零工平台的代表之一，外卖平台不仅具有平台就业的劳动参与和收入激励属性（梁萌，2024），而且已成为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蓄水池”：2023 年，美团外卖平台骑手中 31.6% 曾是失业者，39 万骑手来自国家重点帮扶县^③；饿了么外卖平台骑手包括 36.7 万脱贫人口和 6887 名残障人士^④。外卖平台的出现形成了劳动力市场新的就业吸纳力量，能够帮助低保受助者实现就业并逐步摆脱贫困状态，实现福利退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低保受助人数随着外卖平台的入驻而下降。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外卖平台入驻如何减少低保受助群体规模？本文从就业环境调节效应和劳动收入提升效应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从外卖平台的就业环境调节效应来看，随着外卖平台入驻，送餐服务需求不断上升，平台需要招募大量骑手，这大大增加了平台入驻地区的劳动力需求，因而有助于降低本地的失业率，改善本地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在此背景下，低保受助者可以通过注册为外卖配送骑手重返劳动力市场，摆脱对低保金的依赖并退出福利制度。此外，平台就业对本地劳动力市场也能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骑手工作能够提供一定的自主权和可观的劳动回报（丁守海、陈雯雯，2024）。在此情形下，外卖平台通过调节本地劳动力市场环境激活了低保受助者的就业需求，进而缩减了低保受助群体规模。

然而，受助者实现就业只是第一步，能让其真正退出福利制度的是持续获得劳动收入（Dengler，2019）。平台经济的出现不仅刺激了当地就业，而且具有一定的减贫作用，能够改善低收入者的财务状况（Hamari et al., 2016; Li et al., 2021）。外卖平台更是如此：数据显示骑手月工作收入平均值高于同年度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孙茜，2024），而且外卖配送平台的建立增加了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Gao，2024）。尽管平台的崛起会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Autor et al., 2020），但是外卖平台的福利分配效应仍可保障骑手的劳动收入（蔡跃洲、顾雨辰，2023），缩小骑手与其他劳动者间的工资差距。随着劳动收入逐步挤出救助收入，低保受助者的收入结构得以优化，加速其退出福利制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2a 和 2b

① 来自美团研究院《美团 2023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参见 <https://www.meituan.com/investor/csr-report>。

② 来自饿了么蓝骑士微信公众号《2023 年饿了么骑手权益保障报告》。

③ 来自美团研究院《2023 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参见 <https://waimai.meituan.com/cpc/csrpc/index.html>。

④ 来自饿了么蓝骑士微信公众号《2023 年饿了么骑手权益保障报告》。

并构建外卖平台入驻影响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分析框架（见图 3）。

假说 2a：外卖平台就业具有就业环境调节效应。外卖平台入驻会通过拉动就业实现低保受助者的福利退出。

假说 2b：外卖平台就业具有劳动收入提升效应。外卖平台入驻会通过增加收入实现低保受助者的福利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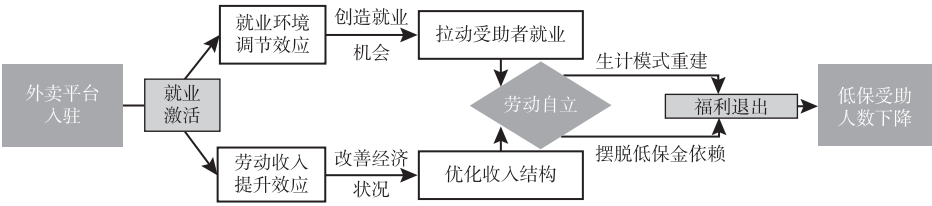


图 3 外卖平台入驻影响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分析框架

三 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为了检验外卖平台入驻对本地低保受助者规模的影响，本文收集了劳动就业、社会救助制度和外卖平台等方面的数据。其中，劳动就业和社会救助制度数据分别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上述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省）。本文收集了历年人口与就业、经济与财政、救助人数、低保支出规模等数据，形成了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以外卖平台入驻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外卖平台兴起时间节点的抓取成为收集数据的关键环节。莫怡青和李力行（2022）将在线招聘网站中外卖骑手招聘广告的最早发布日期设定为外卖平台在该地区兴起的时间。但是由于既往的招聘信息因归档不可查询，借助招聘信息推断平台入驻时间的方法已不可行。考虑到与平台同时期兴起的新媒体主要以网络社交平台为主，本文选择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作为外卖平台企业信息的检索来源。此外，结合外卖平台兴起过程中平台企业存续时长及其市场份额因素，本文以美团外卖、饿了么外卖和百度外卖作为平台企业代表。基于此，本文在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中以上述外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整理这些外卖平台企业发布首条微博或帖子的时间，或者本地餐饮企业、店家或消费者最早发布与上述外卖

相关微博或帖子的日期，以此推断外卖平台入驻该省的年份。

通过将外卖平台入驻年份数据与省级面板数据匹配，最终形成了由外卖平台入驻时间、劳动就业与最低生活保障数据组成的数据库。考虑到外卖平台入驻的年份集中于2014年前后（见表1），本文以2007年至2022年的31个省份为样本，共计得到496个观测值。

（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因变量是低保受助者规模。《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提供了分省的城市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年度受助人数量与户数。考虑到救助制度基层实践中的“单人保”情形会使受助户数虚高，本文采用受助人数而非受助户数刻画受助者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城市低保年度受助人数与农村低保年度受助人数加总，得出低保年度受助人数，用以代理因变量“低保受助者规模”。

此外，本文以外卖平台是否入驻作为自变量。表1显示，自2011年外卖平台开始入驻北京市、上海市和浙江省以来，外卖平台逐渐向全国铺开，至2014年左右已基本覆盖全国大多数省份。样本省份在外卖平台入驻当年及后续年份，自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表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外卖平台入驻年份

平台入驻年份	入驻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	入驻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
2011	3	北京、上海、浙江
2012	3	天津、河北、内蒙古
2013	5	辽宁、黑龙江、福建、山东、海南
2014	17	山西、吉林、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
2015	1	新疆
2016	2	西藏、青海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在控制变量上，本文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纳入了宏观经济、人口规模、地方财政、救助支出、劳动力市场状况、居民收入与消费等变量（Ayala & Melnychuk, 2024; Wallace, 2007），具体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年末常住人口数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规模、城乡低保支出规模、城乡就业人数、高中及以上学历就业人员比重、新增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低保受助者规模（万人）	191.84	141.62	10.13	617.16
自变量	外卖平台入驻	0.59	0.49	0.00	1.00
控制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万亿）	2.14	2.04	0.03	12.47
	年末常住人口数量（亿人）	0.44	0.28	0.03	1.27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千亿）	2.27	2.19	0.02	14.1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规模（亿元）	487.36	345.61	17.30	1762.30
	城乡低保支出规模（亿元）	16.18	10.84	0.54	50.04
	城乡就业人数（万人）	484.08	433.00	17.80	3265.20
	高中及以上学历就业人员比重（%）	31.58	13.40	0.98	77.19
	新增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万人）	38.87	28.89	0.40	187.43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2.06	1.21	0.46	7.80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万元）	1.48	0.79	0.37	4.89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三）模型设定

对低保受助群体规模而言，外卖平台的入驻是一个外生冲击，这为构造准自然实验提供了可能。考虑到外卖平台入驻拥有多个时点，本文构建了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估计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Dibao_{it} = \beta_0 + \beta_1 Platform_{it} + \beta_2 Control_{it} + \mu_i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tag{1}$$

式（1）中，下标 i 表示各省， t 表示年份。因变量 $Dibao_{it}$ 表示省份 i 在 t 年的低保受助人数。 $Platform_{it}$ 是关键自变量，若省份 i 在 t 年有外卖平台入驻则 $Platform_{it} = 1$ ，否则为 0。 β_1 是双重差分的关键系数。 $Control_{it}$ 为控制变量， μ_i 为省份固定效应， φ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四 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影响

表 3 的第（1）列至第（4）列检验了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人数的影响。在第（1）列中，外卖平台入驻的系数估计值为 -43.35 ，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卖平台的入驻降低了低保受助群体规模。随着第（2）列至第（4）列纳入控制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先后控制了年份与省份的双向固定效应，自变量外卖平台入驻的系数逐步稳

定在 -14.66 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外卖平台入驻使全省低保受助人数减少 14.66 万人，外卖平台的出现显著缩小了低保受助群体规模，假说 1 得以验证。由此可见，外卖平台引致了低保受助者的福利退出，为从“就业激活”路径解释低保受助者规模缩减提供了经验证据。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低保受助者规模			
	(1)	(2)	(3)	(4)
外卖平台入驻	-43.35 *** (6.72)	-16.16 *** (6.07)	-14.55 ** (6.88)	-14.66 ** (6.69)
地区生产总值		-1.01 (10.74)	-17.55 (15.59)	-10.07 (14.43)
年末常住人口数量		245.20 *** (58.00)	264.62 *** (62.88)	23.74 (379.10)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32 (8.86)	8.32 (11.19)	10.03 (15.9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规模		-0.04 (0.02)	-0.01 (0.03)	-0.03 (0.04)
城乡低保支出规模		7.38 *** (1.33)	4.78 *** (1.48)	4.44 *** (1.60)
城乡就业人数		-0.01 (0.03)	-0.01 (0.03)	-0.01 (0.03)
高中及以上学历就业人员比重		1.41 (0.87)	0.75 (0.97)	1.27 (1.22)
新增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0.11 (0.19)	0.22 (0.25)	0.35 (0.3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6.81 * (34.83)	95.97 ** (38.98)	86.82 * (44.15)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9.46 ** (56.34)	-238.54 *** (78.95)	-214.52 ** (99.34)
常数项		33.63 (25.75)	60.78 (43.56)	138.66 (176.75)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496	335	335	335
R ²	0.12	0.40	0.51	0.51

注：括号内为省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得出了上述结论，但结论是否稳健取决于能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外卖平台入驻前各省份的因变量发展趋势基本相同。因此，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判断外卖平台入驻前各省份的低保受助群体规模变动趋势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本文以外卖平台入驻前一年度作为基准年份，生成各省距离外卖平台入驻时点的虚拟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根据估计系数及其 95% 的置信区间绘制图 4 发现，外卖平台入驻前相对时点虚拟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其 95% 的置信区间内均包含了 0 值，表明平台入驻前各省的低保受助群体规模变动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外卖平台入驻后相对时点虚拟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外卖平台入驻减小了低保受助群体规模。以上结果说明本文使用的双重差分模型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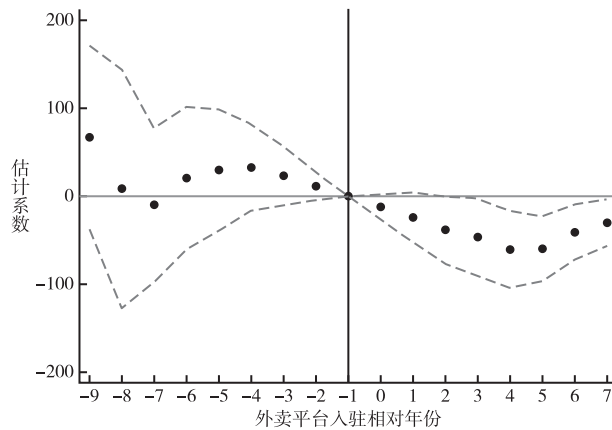


图 4 平行趋势检验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此外，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还取决于是否能够排除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具体做法是对省份和年份样本进行随机化处理，即同时虚构外卖平台入驻的省份和年份以得到外卖平台入驻的“伪变量”，随后重新进行回归并获得“伪变量”的估计系数与 p 值。根据此过程重复 500 次后得到的估计系数和 p 值绘制的图 5 显示，估计系数的核密度曲线大部分处在图中 -14.66 竖虚线的右侧，p 值大部分处在图中 0.1 横虚线的上侧，表明绝大多数“伪变量”的估计系数都偏离真实值

且不显著。这意味着基准回归结果并不是受到其他随机因素影响偶然得到，说明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影响是稳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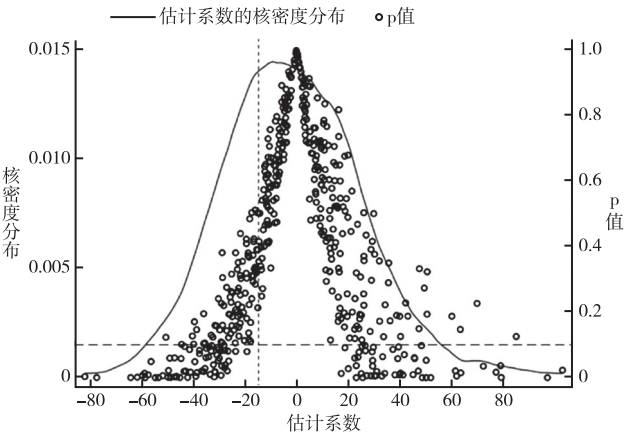


图 5 安慰剂检验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2. 替换变量及滞后效应分析

考虑到城乡低保受助者规模存在数量级差异，本文分别考察了外卖平台入驻对城市低保受助者规模和农村低保受助者规模的影响。表 4 的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外卖平台入驻同时减少了城乡低保受助群体规模。但由于城市低保受助者人数远少于农村地区，因此外卖平台入驻所引致的福利退出规模也小于农村地区。

表 4 外卖平台入驻对城市与农村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影响

	城市低保受助者规模	农村低保受助者规模
	(1)	(2)
外卖平台入驻	-2.66 * (1.30)	-12.00 * (6.44)
常数项	-62.68 (41.39)	201.33 (155.9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35	335
R ²	0.80	0.54

注：括号内为省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另外，零工平台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平台零工就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莫荣、鲍春雷，2021），这种影响传导至劳动密集型零工群体（赖德胜、关棋月，2023）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平台就业对该群体劳动参与意愿的调动及后者就业能力的形成存在一个过程，这使得低保受助者平台就业实践对其生计模式的影响会缓慢释放。此外，完成申领或退出福利资格的文书工作也需要时间（Ayala & Pérez, 2005）。因此，外卖平台入驻带来的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缩减效应可能存在滞后性。考虑到这一点，本文生成了因变量的一阶（ $t+1$ ）、二阶（ $t+2$ ）、三阶（ $t+3$ ）、四阶（ $t+4$ ）和五阶（ $t+5$ ）前推项，分别代表第二年至第六年的低保年度受助人数量，随后代替原因变量分别代入式（1）回归得到表 5 的第（1）列至第（5）列。

从显著性水平来看，第（5）列的自变量估计系数不再显著，表明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影响会持续 5 年左右，直到外卖平台入驻的第六年才消除。从估计系数来看，替换因变量后估计系数有所增大，说明外卖平台入驻后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持续的。从图 1 也可以看出，随着 2014 年外卖平台在全国基本铺开后，中国低保受助人数量开始骤降，这一趋势持续了 5 年，到 2019 年开始低保受助人数量的下降趋势基本结束，低保受助规模在后续年份保持在恒定的水平上，这也印证了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表 5 基于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第二年的低保受助者规模	第三年的低保受助者规模	第四年的低保受助者规模	第五年的低保受助者规模	第六年的低保受助者规模
	(1)	(2)	(3)	(4)	(5)
外卖平台入驻	-15.36 ** (6.69)	-20.66 *** (6.37)	-20.46 ** (7.87)	-17.78 * (9.82)	-6.99 (9.07)
常数项	57.03 (130.51)	4.58 (103.86)	-52.79 (98.05)	-50.52 (116.10)	-24.33 (131.1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35	335	335	335	335
R ²	0.52	0.63	0.68	0.70	0.72

注：括号内为省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3. 竞争性假说检验

早期研究发现，西方福利国家福利水平的提升会带来受助人数的增加，救助金每增加1%，受助人人数就会增加0.457%（Falvo & Jadidzadeh, 2020）。但是，中国当前的救助标准本身偏低（Xiao et al., 2023），而且出现了低保标准提升后受助人人数下降的现象（王强, 2023；岳经纶、胡项连, 2018）。这种“标提量减”悖论让低保标准对受助人数的影响更加复杂。因此，在验证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影响时，还需要排除低保标准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本文将城市低保年均标准和农村低保年均标准取均值得到“低保年均标准”这一变量，并将其纳入基准回归模型。

表6的第（1）列显示，在控制了低保年均标准变量后，外卖平台入驻变量的估计系数为-12.01，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自变量的系数略有下降，但系数依旧显著。现实中，各省的低保标准参差不齐，这是由于低保标准通常依据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制定。因此，低保标准相对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更能够反映实际保障能力。基于此，本文将“低保年均标准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纳入模型，得到第（2）列。可以发现，外卖平台入驻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同样未发生较大变化。这表明，尽管低保标准水平的提升可能减少受助人人数，但“标提量减”现象未对本文假说1产生影响，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6 竞争性假说检验

	低保受助者规模			
	(1)	(2)	(3)	(4)
外卖平台入驻	-12.01 * (6.48)	-10.51 * (6.17)	-14.92 ** (6.63)	-11.32 * (5.98)
低保年均标准	-0.20 (0.16)			
低保年均标准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5.19 * (2.71)		
地方政府困难群体转移支付强度			41.05 (33.0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8.04 (25.69)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4.86 (38.62)
常数项	173.81 (150.57)	260.12 * (136.44)	806.18 (579.64)	161.41 (296.08)

续表

	低保受助者规模			
	(1)	(2)	(3)	(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05	305	335	305
R ²	0.48	0.50	0.52	0.47

注：括号内为省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尽管前述回归模型已控制地方财政收支对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影响，但已有研究认为，社会救助领域的财政分权也会对救助群体规模产生缩减效果。例如，已有研究发现，当救助支出责任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时，地方政府会出于控费的经济动机严控福利群体规模（Roelofs & van Vuuren, 2017）。与国外救助领域的财政分权趋势不同，中国对困难群体的专项转移支付中，中央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大的支付责任（边恕等，2023）。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会挤出部分地方政府的低保支出，使得看似加大的财政转移支付强度并没有扩大受助群体规模，这显然与财政分权导致的救助群体萎缩的逻辑一致。可见，除政府低保支出的绝对数额对受助群体规模产生影响外，地方性的困难群体财政转移支付强度同样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以低保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来构造“地方政府困难群体转移支付强度”变量，并将其纳入模型，得到第（3）列。在控制了转移支付强度后，外卖平台入驻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证明了外卖平台入驻后低保受助人数降低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再者，已有研究还观察到受助者在社会保障体系各项目间转移的现象（Roelofs & van Vuuren, 2017；Schmidt & Sevak, 2004），并提出受助人数之所以下降，是由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发挥了承接作用，这使得社会保障体系中其他项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据此，本文认为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影响还受到社会保险的影响，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遵循这一思路，本文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两个变量纳入模型，得到表 6 的第（4）列。此时，外卖平台入驻变量的系数变为 -11.32 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但两项社会保险项目的系数均不显著，回归结果并未改变基准模型的结论。

五 外卖平台入驻影响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潜在机制

本文认为，劳动力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劳动收入波动带来的就业拉动和收入提升效应是外卖平台就业影响低保受助者福利退出行为的潜在机制。为了检验外卖平台入驻的就业环境调节效应和劳动收入提升效应，本文分别以年末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住宿和餐饮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刻画就业环境调节效应，以住宿和餐饮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占劳动者报酬的比重、低保支出占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刻画劳动收入提升效应。

表7的第(1)列和第(2)列显示，外卖平台入驻导致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的下降和餐饮从业人数的上升，这表明外卖平台的入驻改善了本地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新增的骑手岗位不仅吸纳了大量失业者，也为劳动者踏入餐饮行业提供了契机。此外，第(3)列和第(4)列显示，外卖平台入驻也会提升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工资在劳动者报酬中的比重，同时降低低保支出占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因此，外卖平台入驻不仅带来了行业性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也有助于降低从业者总收入中政府转移性收入的比重。可见，外卖平台入驻能够提高低保受助者的劳动参与率并改善其经济状况。就业环境调节和劳动收入提升效应是外卖平台入驻鼓励低保受助者福利退出的有效机制，假说2a和2b得以验证。

表7 外卖平台入驻影响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机制

	年末失业保险金 领取人数	住宿和餐饮业城镇 单位就业人数	住宿和餐饮业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比重	低保支出占劳动者 报酬的比重
	(1)	(2)	(3)	(4)
外卖平台入驻	-0.75 * (0.43)	0.71 * (0.39)	0.05 ** (0.02)	-0.66 ** (0.28)
常数项	13.23 (16.72)	6.11 (12.09)	0.57 ** (0.28)	1.25 (4.8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39	305	335	335
R ²	0.27	0.63	0.39	0.45

注：括号内为省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六 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群体规模影响的异质性

近年来，零工平台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低收入劳动者转换生计的新赛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涌入外卖平台就业，不仅劳动力市场结构会发生变化，而且收入分配格局也将被重构（李力行、周广肃，2022）。因此，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者的影响也会因本地就业环境、人口密度与结构等因素而变化，使外卖平台入驻的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缩减效应呈现异质性。

表 8 的第（1）列展示了就业环境变量对外卖平台入驻引致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缩减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第（1）列纳入了外卖平台入驻与城镇新增登记失业人数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为 -15.82 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卖平台入驻后低保受助者人数的波动与同期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在不利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面向低保受助者的岗位空间不断压缩。平台入驻不仅能为处于就业状态的受助者提供转换赛道的机会，也使失业的受助者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收入水平，进而实现福利退出。

结合人口要素来看，表 8 的第（2）列中，外卖平台入驻与城市人口密度的交互项系数为 -0.01，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城市人口密度较高的省份，外卖平台入驻引致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缩减效应有所强化。本文认为，在城市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大量从业人员的涌入加速了平台经济发展，强化了平台吸纳就业的能力。因此，人口聚集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外卖平台对低保受助者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激活效应。此外，第（3）列将外卖平台入驻与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交互项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交互项的系数为 -3.64，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的地区，外卖平台入驻更容易引致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缩减，外卖平台入驻对受助者就业面拓展的帮助体现得更明显。

表 8 劳动力市场与人口变量发挥的调节作用

	低保受助者规模		
	(1)	(2)	(3)
外卖平台入驻 × 城镇新增登记失业人数	-15.82 ** (5.82)		
外卖平台入驻 × 城市人口密度		-0.01 ** (0.01)	

续表

	低保受助者规模		
	(1)	(2)	(3)
外卖平台入驻 ×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 3.64* (2.01)
常数项	146.00 (175.27)	155.65 (176.67)	127.37 (174.9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35	335	340
R ²	0.52	0.53	0.51

注：括号内为省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 的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以及作者收集的外卖平台入驻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语与讨论

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受助者人数在 2014 年左右开始稳步下降，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跳出制度纠偏、系统性遗漏、资源限制和政策成效等已有的政策解释路径，本文从就业激活的角度分析了低保受助者人数下降的原因，并紧密结合平台经济创造的新型就业模式，分析了低保受助群体实现劳动自立的可能性。通过以外卖平台入驻作为外生冲击模拟准自然实验，本文借助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外卖平台入驻带来的低保受助者规模缩减效应进行了估计。

研究发现，各省的低保受助人数的在外卖平台入驻后显著下降，而且外卖平台入驻对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影响会持续 5 年左右。因此，以外卖平台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力量能够长期持续地引致福利退出。就异质性而言，外卖平台入驻带来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的缩减会因本地就业环境的恶化、城市人口的聚集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增加而得以强化。就作用机制而言，外卖平台入驻不仅吸纳了大量失业者，改善了本地的劳动力市场环境，而且在提高行业性收入水平的同时促使从业者从依靠政府转移性收入向依靠自身劳动收入转变。由此，低保受助者可以通过外卖平台赚取劳动收入来重建生计模式，并逐步摆脱对低保金的依赖，最终退出低保制度。可见，外卖平台入驻能够促进劳动参与和改善经济状况，因此就业环境调节和劳动收入提升是外卖平台入驻激活低保受助者的有效机制。

一直以来,劳动就业对低保受助者的拉动作用广受关注。随着中国低保受助者人数不断下降,验证劳动就业福利退出效果的机会窗口出现。更重要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零工就业因其低入职门槛、高劳动收入、高自由度等特征逐渐成为低保受助者劳动实践的首要选择。因此,本研究在平台零工就业现象和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缩减现象间架起桥梁,证明了平台劳动的就业激活功能,以及数字经济时代低保受助者实现劳动自立的可行性。基于此,未来面向低保受助者的就业援助及公共就业服务有必要结合平台劳动的时代特征进行调整。

第一,积极开发平台实习实践岗位,引导处于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受助者开展平台劳动,并为从业者提供平台从业职业生涯规划。第二,更新就业援助项目内容,围绕数字平台设计技能培训项目,帮助低保受助者掌握平台就业的知识与技能。第三,全面采集平台用工数据,为具有平台零工就业意愿的低保受助者提供岗位信息,同时辅助受助者与用工平台对接。第四,畅通低保受助者在平台间的流动渠道,强化其风险防范意识,并对受助者的社会保险缴费适当提供补贴。

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与救助制度联动的复杂性,本文潜在的问题和后续研究计划如下。首先,尽管本文验证了外卖平台入驻与低保受助群体规模缩减之间的关系,但不同平台的就业激活功能可能存在异质性,这一点在后续研究中有待验证。其次,本文的观察局限于省份层面,这使得分析的颗粒度较粗,未来可采用地市级或微观调查数据开展分析,以增加研究的精细度。再次,就业激活的效果与宏观经济周期和整体就业环境密不可分,因此需在更长的时间窗口内观察平台零工就业如何应对经济波动,因而长期追踪观察必不可少。最后,福利退出已被证明具有重复性,即部分低保受助者可能会在救助制度中“进进出出”。但本文的研究聚焦于省一级,难以呈现出微观层面的福利动态,因此后续分析可借助微观数据库开展个体层面的分析。

参考文献:

- 安超(2021),《退出低保:基于社会救助功能变迁的分析》,《社会发展研究》第4期,第58-80页。
- 边恕、毕研菲、张瑞(2023),《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央地财政分担比例优化》,《地方财政研究》第8期,第36-49页。
- 蔡跃洲、顾雨辰(2023),《平台经济的社会福利机制及其效果测算——来自外卖平台

- 商户问卷调查的证据》，《经济研究》第5期，第98-115页。
- 程璆、岳经纶（2023），《低保污名化困境的生成与消解——基于广东省E县低保识别改革的案例分析》，《求实》第5期，第96-108页。
- 丁守海、陈雯雯（2024），《去上班还是送外卖：数字经济下劳动者的就业选择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期，第118-133页。
- 方珂、张翔、蒋卓余、练宏（2023），《从“自保式执行”到有效治理——地方自主性实践的制度路径转换》，《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158-181页。
- 韩克庆、郭瑜（2012），《“福利依赖”是否存在？——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一个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149-167页。
- 吉尔伯特·沃黑斯（2004），《激活失业者——工作导向型政策跨国比较研究》，王金龙等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 贾洪波、毛博书（2023），《新时代最低生活保障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发展研究》，《管理学刊》第6期，第1-20页。
- 赖德胜、关棋月（2023），《零工经济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关系差异性分析》，《北京社会科学》第1期，第66-75页。
- 李力行、周广肃（2022），《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变化趋势与政策应对》，《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第46-59页。
- 李棉管（2019），《自保式低保执行——精准扶贫背景下石村的低保实践》，《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188-212页。
- 李鹏、张奇林（2023），《我国低保规模持续缩减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基于“情境—结构—执行”分析框架》，《兰州学刊》第3期，第64-76页。
- 李琴、岳经纶（2021），《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社会福利权的实现？——基于贫困治理的实证研究》，《公共行政评论》第3期，第79-97页。
- 梁萌（2024），《“数字泰勒主义”影响下的外卖平台“计件工资制”研究》，《社会》第3期，第1-26页。
- 林闽钢（2023），《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发展现状和健全思路》，《行政管理改革》第1期，第4-11页。
- 刘凯、张瑞凯（2017），《低收入家庭的失业与就业：人群、趋势及国际比较》，《社会建设》第3期，第16-25页。
- 刘璐婵（2023），《从设立到并轨：农村低保的政策效应研究》，《社会保障评论》第6期，第137-157页。

- 刘万里、吴要武 (2016), 《精准识别: 用技术完善城市低保的退出机制——以上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为例》, 《经济学报》第 4 期, 第 36–61 页。
- 马爽 (2017), 《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第 183–194 页。
- 莫荣、鲍春雷 (2021), 《促进零工经济劳动力市场规范发展研究》, 《中国劳动》第 4 期, 第 5–15 页。
- 莫怡青、李力行 (2022), 《零工经济对创业的影响——以外卖平台的兴起为例》, 《管理世界》第 2 期, 第 31–45 页。
- 孙茜 (2024),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职业群体的就业质量分析——以外卖骑手为例》, 《新视野》第 1 期, 第 95–102 页。
- 王强 (2023),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受助规模持续缩减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政策执行视角的分析》, 《社会保障评论》第 2 期, 第 127–144 页。
- 王燊成 (2023), 《揭开未就业的面纱: 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障碍及其政策应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第 7 期, 第 74–90 页。
- 王燊成、刘宝臣 (2018), 《就业促进政策能提高城镇困难家庭的就业参与吗?》, 《学习与实践》第 12 期, 第 91–102 页。
- 姚建平 (2017), 《多元视角下的城乡低收入家庭就业状况研究》, 《社会保障评论》第 2 期, 第 88–101 页。
- 岳经纶、胡项连 (2018), 《低保政策执行中的“标提量减”: 基于反腐败力度视角的解释》, 《中国行政管理》第 8 期, 第 70–75 页。
- Achdut, Netta & Haya Stier (2016). Long-Term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Patterns of Welfare Recipients: The Role of the Local Labor Market. *Social Service Review*, 90 (4), 647–682.
- Achdut, Netta & Haya Stier (2021). The Role of Monetary and Non-Monetary Job Quality Components in Determining Welfare Exit.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50 (1), 79–103.
- Autor, David, David Dorn, Lawrence Katz, Christina Patterson & John Van Reenen (2020).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2), 645–709.
- Ayala, Luis & César Pérez (2005).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Demographic Structure: What Causes Welfare Caseload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8 (3), 563–581.

- Ayala, Luis & Mariya Melnychuk (2024).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Expansions and Recessions on Social Assistance Duration: The Case of Regional Minimum Income Programmes in Spain. *Review of Public Economics*, 248 (1), 115 – 141.
- Berg, Janine (2016). Income Security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Findings and Policy Lessons from a Survey of Crowdworkers. *ILO Conditions of Work and Employment Series*, No. 74.
- Bergmark, Åke & Olof Bäckman (2004). Stuck with Welfare? Long-Term Social Assistance Reciprocity in Swede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 (5), 425 – 443.
- Bergnehr, Disa (2016). Unemployment and Conditional Welfare: Exclusion and Belonging in Immigrant Women's Discourse on Being Long-Term Dependent on Social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5 (1), 18 – 26.
- Bonhomme, Macarena & James Muldoon (2024). Racism and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Shaping Migrants' Work Experience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l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https://doi.org/10.1080/01419870.2024.2349268>.
- Card, David & Dean Hyslop (2005).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a Time-Limited Earnings Subsidy for Welfare-Leavers. *Econometrica*, 73 (6), 1723 – 1770.
- Dahl, Espen & Thomas Lorentzen (2003). Explaining Exit to Work Among Social Assistance Recipients in Norway: Heterogeneity or Dependenc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5), 519 – 536.
- Dengler, Katharina (2019). Effectiveness of Active Labour Market Programmes on the Job Quality of Welfare Recipients in German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48 (4), 807 – 838.
- Dunn, Michael (2020). Making Gigs Work: Digital Platforms, Job Quality and Worker Motivations.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35 (2), 232 – 249.
- Falvo, Nick & Ali Jadidzadeh (2020). Determinants of Social Assistance Caseloads for Employable Single Adults Without Dependents in Canada.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54 (6), 865 – 882.
- Ganong, Peter & Jeffrey Liebman (2018). The Decline, Rebound, and Further Rise in SNAP Enrollment: Disentangling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and Policy Chang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0 (4), 153 – 176.
- Gao, Ziming (2024).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Development of Take-Away Delivery and Urban-Rural Wage Inequality.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16 (4), 609 – 628.

- Hamari, Juho, Mimmi Sjöklint & Antti Ukkonen (2016). The Sharing Economy: Why People Participate i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7 (9), 2047 – 2059.
- Hill, Brian & Matthew Murray (2008). Interactions Between Welfare Caseloads and Local Labor Market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6 (4), 539 – 554.
- Hoynes, Hilary Williamson (2000). Local Labor Markets and Welfare Spells: Do Demand Conditions Matter.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2 (3), 351 – 368.
- Huber, Martin, Michael Lechner, Conny Wunsch & Thomas Walter (2011). Do German Welfare-to-Work Programmes Reduce Welfare Dependency and Increase Employment? *German Economic Review*, 12 (2), 182 – 204.
- Lam, Laura & Anna Triandafyllidou (2021). An Unlikely Stepping Stone? Exploring How Platform Work Shapes Newcomer Migrant Integration. *Transitions: Journal of Transient Migration*, 5 (1), 11 – 29.
- Lehdonvirta, Vili (2018). Flexibility in the Gig Economy: Managing Time on Three Online Piecework Platforms.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33 (1), 13 – 29.
- Li, Ziru, Yili Hong & Zhongju Zhang (2021). The Empowering and Competition Effects of the Platform-Based Sharing Economy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of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38 (1), 140 – 165.
- Mayer, Anne-Sophie, Andreas Ihl, Susanne Grabl, Kim Strunk & Marina Fiedler (2024). A Silver Lining for the Excluded: Exploring Experiences That Micro-Task Crowdsourcing Affords Workers with Impaired Work Access.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https://doi.org/10.1111/isj.12511>.
- Pongratz, Hans (2018). Of Crowds and Talent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Global Online Labour.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33 (1), 58 – 73.
- Roelofs, Gijs & Daniel van Vuuren (2017).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Social Assistance and the Rise of Disability Insurance Enrolment. *De Economist*, 165 (1), 1 – 21.
- Scherpf, Erik & Benjamin Cerf (2019). Local Labor Demand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Dynamics: Evidence from New York SNAP Administrative Record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38 (2), 394 – 425.
- Schmidt, Lucie & Purvi Sevak (2004). AFDC, SSI, and Welfare Reform Aggressiveness: Caseload Reductions Versus Caseload Shifting.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9 (3),

792 – 812.

- Schor, Juliet, William Attwood-Charles, Mehmet Cansoy, Isak Ladegaard & Robert Wengronowitz (2020). Dependence and Precarity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49 (5 – 6), 833 – 861.
- Sundararajan, Arun (2017).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End of Employment and the Rise of Crowd-Based Capitali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Vaalavuo, Maria & Outi Sirniö (2022). Jobs Against Poverty: A Fixed – Effects Analysis on the Link Between Gaining Employment and Exiting Poverty in Europe. *European Societies*, 24 (4), 431 – 462.
- van der Klaauw, Bas & Jan van Ours (2013), Carrot and Stick: How Re – Employment Bonuses and Benefit Sanctions Affect Exit Rates from Welfare.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8 (2), 275 – 296.
- van Doorn, Niels, Fabian Ferrari & Mark Graham (2023). Migration and Migrant Labour in the Gig Economy: An Interventio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7 (4), 1099 – 1111.
- Wallace, Geoffrey (2007). Welfare Flows and Caseload Dynamic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10 (2), 415 – 442.
- Xiao, Meng, Honglin Chen, Feiyue Li & Yu Guo (2023). The Dynamics of Social Assistance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52 (4), 840 – 863.

The Employment Activation Explanation for the Declining of Dibao Caseload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Entry of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Liu Lucha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entry of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as an exogenous shock to simulate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explaining why the Dibao caseloads have shru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ment activation. This paper uses provincial panel data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he entry of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on reducing the Dibao caseloads by constructing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DID) model.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number of Dibao caseloads in each provinc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ollowing the entry of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and this effect persisted for approximately five years. This conclusion is robust to fluctuations in the Dibao standard, the intensity of local government transfer payments to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projects. The estimated effect is amplified by increases in newly registered unemployed persons, urban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ntry of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improves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increases labor income, thereby boosting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and economic status of Dibao recipients. Dibao recipients can rebuild their livelihoods by earning labor income, gradually reducing their dependence on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funds, and eventually exiting the low-income assistance system.

Keywords: Dibao, platform employment, welfare exit, employment activ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I38, J21, P36

(责任编辑: 马 超)